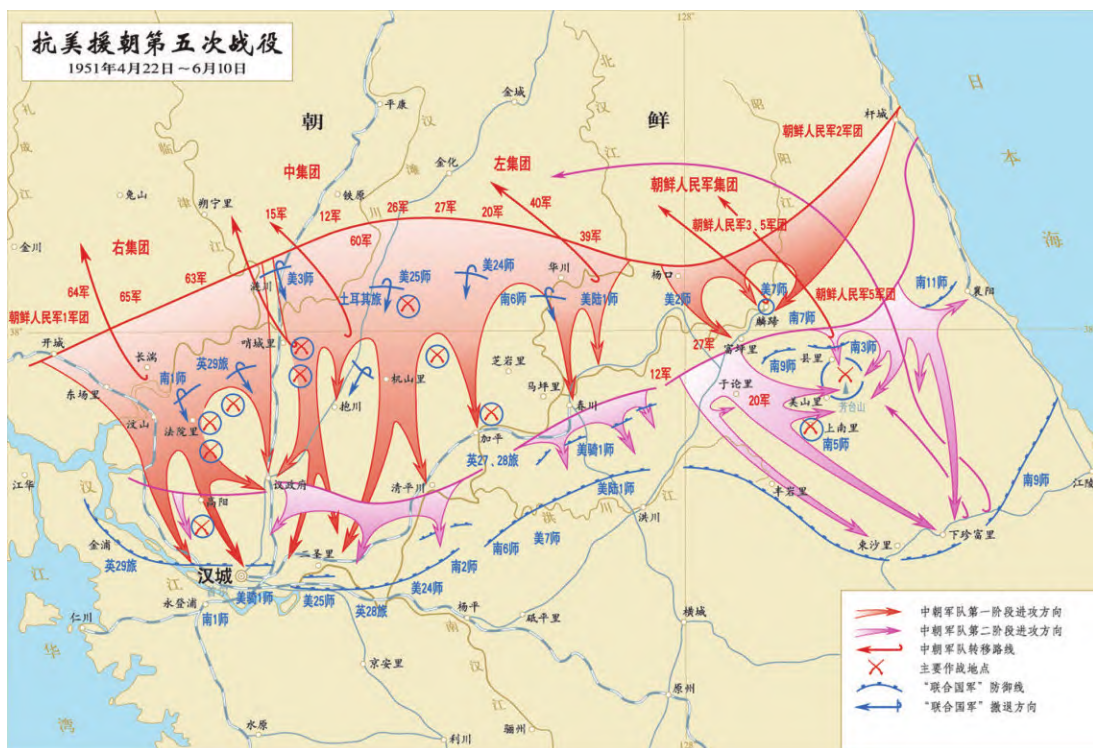


#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 筹划决策研究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 田丰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邵志勇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经过要图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朝军队联合发起了第五次战役。这场战役起初被称为春季攻势作战，后正式命名为第五次战役。从最初战役设想到最终战役发起，时间跨度近6个月，战役筹划不断根据战场形势变化进行调整，但其中不乏一些争议问题。梳理第五次战役筹划决策过程，对当前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第五次战役的最早设想 ——春季攻势作战

1950年12月，志愿军在连续发起两次战役后，伤亡消耗巨大，进攻能力已趋于顶点，不过考虑到政治上的重大影响，中共中央准备发动第三次战役。为了取得更大的歼敌目标，毛泽东、彭德怀在部署第三次战役时就已经开始筹划休整后组织一次大的战役，即春季作战。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有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



1950年底，志愿军部队对南逃的美军实施追击



志愿军在艰苦环境中连续作战，伤亡减员未得到及时补充，部队急需休整。  
图为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中露营

备粮弹……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sup>[1]</sup>。

由于两次战役给敌以重大杀伤，并很快将战线推至“三八线”以南，各级速胜轻敌的思想已有苗头，但高层对于朝鲜战局的判断还较为客观。12月19日彭德怀致电军委，他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sup>[2]</sup>，毛泽东表示赞同，并于12月26日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sup>[3]</sup>。由此可见，这期间并未对春季攻势作战明确较大的政治军事目标。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中共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20页。

[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中共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页。



## “最后性质”的 “决定性一战”

第三次战役的胜利结束，志愿军将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赶至“三七线”附近，解放汉城，朝鲜战局的发展意想不到的顺利。这时，不仅苏联和朝鲜方面，就连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也对朝鲜战争发展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党委给各级党委的电报指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准备充分的作战力量（体力、物力、战术、技术等项），很好地总结历次战役经验，特别是第三次战役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下一战役开始，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也是在休整期间所应具体准备的”<sup>[1]</sup>。毛泽东对春季攻势作战极为重视并抱有很高期望，1月14日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春季（四月和五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完成各项准备，然后举行最后性质的春季作战”<sup>[2]</sup>。1月19日，他在修审彭德怀在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加写了一段话，“这是有决定性的一战，必

须准备得好，打得好”<sup>[3]</sup>。就这样，春季攻势作战对于全歼敌人、解放朝鲜带有“最后性质”“决定性一战”的作用被明确起来，也凸显出各级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巨大信心和决心。

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最后性质”“决定性一战”并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春季攻势作战即为朝鲜战争最后一战，一次战役即可彻底解决朝鲜问题。195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朝鲜战争胜利应注意事项给西北局的指示中指出，“首先应强调朝鲜战争胜利已成定局，但应估计还要有艰苦的斗

争”<sup>[4]</sup>。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果已然胜券在握，但指出仍有艰苦斗争。春季攻势并不是意味着“毕其功于一役”，而是“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sup>[5]</sup>，春季攻势作战只是这几个战役里的第一个战役，首战至关重要，所以具有了“决定性一战”的意义。

## “联合国军”反扑 扰乱先期筹划

1951年1月15日，“联合国军”在西线发动了名为“猎狼犬行



1951年1月14日，中朝军队解放汉城。图为中朝军队在李承晚集团伪“国会大厦”前欢庆胜利

[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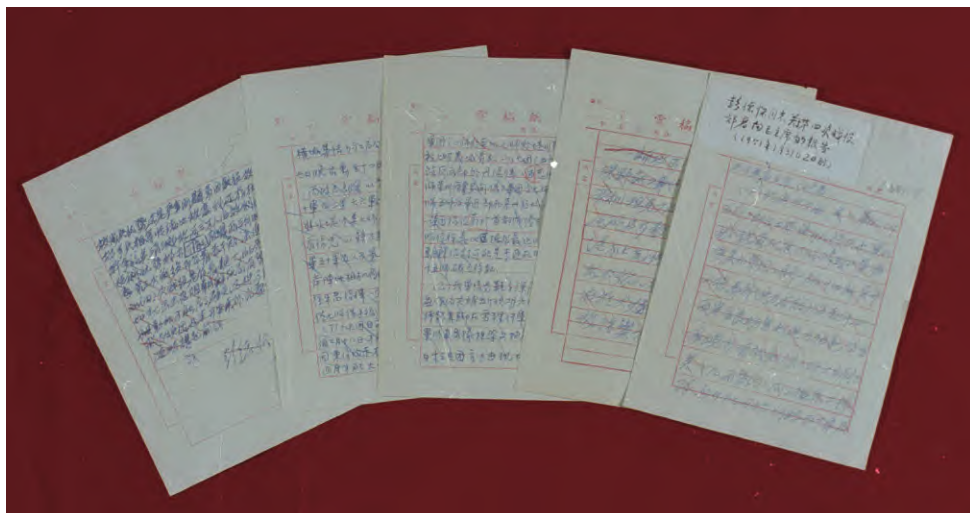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页。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5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3页。

动”的试探性进攻后，于25日全线展开反扑，志愿军原定的休整计划被完全打破，被迫投入到完全没有计划预案的第四次战役。敌人反扑突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1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sup>[1]</sup>。可以看到，此时毛泽东对于第五次战役性



1951年1月31日，彭德怀关于《第四次战役部署》向毛泽东的报告



第四次战役中，美第187团级战斗队在汶山附近伞降

质目标的认识没有变化，依然是带有“最后性质”的。

随着第四次战役的进行，毛泽东、彭德怀从战场形势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战争很可能长期化。2月5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高岗，“金日成同志来此商谈，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sup>[2]</sup>。2月9日，经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研究后致电志愿军及各军区，“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在达到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5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



战的方针”<sup>[1]</sup>。这意味着毛泽东、彭德怀对原定春季攻势作战即第五次战役开始有了新的考虑，尽管第五次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仍作继续，但是已经开始调整“最后性质”一战的目标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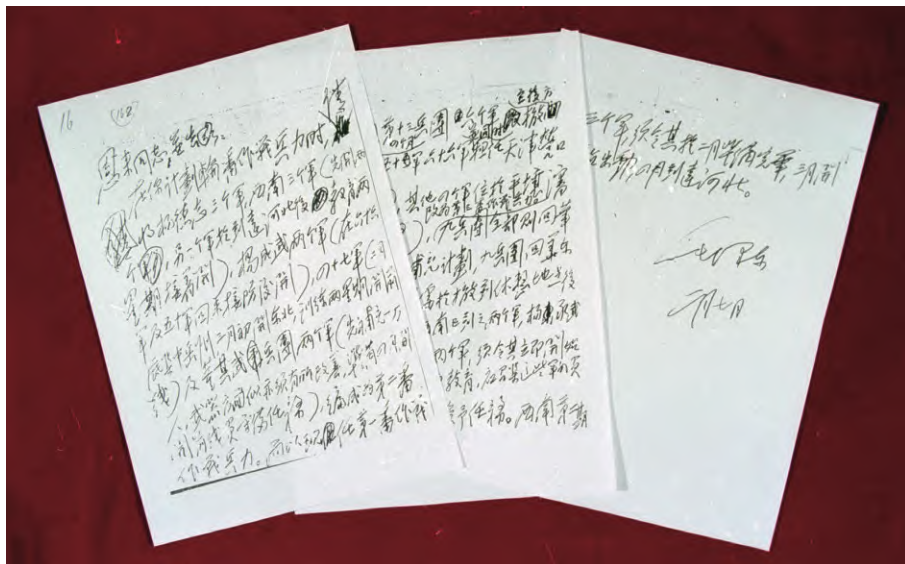
2月21日，彭德怀在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利用作战间隙返回北京，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在听取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场实际困难情况后，毛泽东作出了战略指导上的重大指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

要急于求成”<sup>[2]</sup>。这也就意味着，仍在准备着的第五次战役，已经不再具备之前“最后性质”“决定性一战”的意义了。4月6日，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上将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sup>[3]</sup>，并指出“我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装备，改善供给运输线，加强后勤机构，并努力准备空军、装甲部队参战，这就是为了尽可能争取短期”<sup>[4]</sup>，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侧重点都是在“争取短期”上。

要说明的是，3月9日彭德怀返回志愿军司令部后签发的一系列电文，在提到第五次战役时，仍然沿用“决定性”的说法。3月11日急电周恩来，“我空军如再不能掩护交通运输，此种困难将会增加，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战役”<sup>[5]</sup>；同日致电志愿军后方勤务部政委周纯元、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应在南川店、铁原及其以北储存大量粮弹及作战物资，保证下一决定性战役之胜利”<sup>[6]</sup>；3月14日给各军并报军委、东司的电报指出“下一战役是带决定性的一仗”<sup>[7]</sup>。但其中“决定性”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由打“最后性质”的“决定性一战”，转变为“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sup>[8]</sup>的“决定性一仗”。

## 战役发起时间多次调整

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一直是志愿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筹划的关键问题。2月中旬，砥平里战斗受挫。彭德怀为争取时间，集中兵力，为下次战役创造条件，于18日、19日致电军委，“下次战役将于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关于《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周恩来的信

- [1]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 [3]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 [4]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 [5]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 [6]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 [7]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 [8]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1951年2月13日凌晨，志愿军开始围攻驻守砥平里的美军。16日，志愿军果断停止攻击，全线转入运动防御，至此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图为志愿军某部在砥平里战斗中寻机歼敌

4月初旬在汉城至洪川之线及以北地区，集中可能使用的兵力（包括空军在内）在该地区反击歼灭敌人”<sup>[1]</sup>，“待二番兵团九个军全部到达战役准备位置时，我第一番兵团即可采取诱敌深入，让敌进占东豆川、春川线以南，大举歼灭之”<sup>[2]</sup>。这是对第五次战役的最初构想，战役发起时间大致定为4月初旬，战役地点预设东豆川、春川线以南，战役发起的前提是二番兵团九个军全部到达战役准备位置，集中可能使用的兵力。

2月28日，出于快速扭转战场被动的考虑，邓华、朴一禹、洪学智、解方致电正在北京的彭德怀，建议集中6至8个军，包括第26

军和刚入朝的第19兵团，在3月间组织一次较大的战役，以有力打击北犯之敌。<sup>[3]</sup>3月2日，彭德怀



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某部向前线开进

回复表示不赞同，“从目前情况看，3月组织一次较大战役，事实上恐有困难”<sup>[4]</sup>，并指出“3月勉强进行一次较大战役，可能引起敌人过早注意我第二番兵团，致敌不敢大胆前进。据此宜按原定计划加紧准备于4月大举出击较为有利”<sup>[5]</sup>。彭德怀返回志愿军总部后，于3月10日下达部署电，要求各兵团“须于4月10日前全部到达集结位置，待机歼敌”<sup>[6]</sup>。根据这个部署，如果第二番作战部队能够按计划于4月10日前全部到达集结位置，那么4月中旬便可寻机发起战役。

仅过了几天，彭德怀便发现，按照第二番部队实际开进速度，以4月10日作为所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的最后时限是无法实现的。

[1]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页。

[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79页。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1页。

[4]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5]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6]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3月14日，彭德怀致电各军并报军委、东司，“我九兵团须于四月十日至上旬始能集结于铁原、金化、平康地区。三兵团及机动炮兵、坦克部队，亦须于四月中旬始能集结于伊川、谷山、新溪、遂安地区。人民军第二番参战两个军团补充兵员，也须四月初旬完成。故要在四月下旬才能发起进攻战役”<sup>[1]</sup>。又过了几天，出现了新的问题：除第二番部队难以在预定时间到达集结位置外，第五次战役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资源物资也无法如期送到。彭德怀不得不对战役发起时间再次进

行调整，于3月23日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指出“战役必需物资仍未运来，故需改为5月初旬集中第三、九、十九兵团全力出击，以求必胜，改变目前态势”<sup>[2]</sup>。就这样，第五次战役发起时间一直向后调整——从4月中旬推迟到4月下旬，再推迟到5月初旬。

4月初，所谓“联合国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志愿军总部根据从各个方面得到的情报，和对敌军在朝鲜战场上活动的种种迹象及敌军阵营的各种情况分析，作出判断：敌进占“三八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而且从侧后登

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为大。<sup>[3]</sup>6日，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上指出“敌似图在东线发动攻势，并在东海岸通川、元山登陆配合进攻”“敌人在四、五、六月内，可能获得后备兵力不下十二万”<sup>[4]</sup>。可以看出，彭德怀所担心的，一是美军在侧后方实施登陆，从而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重现“仁川登陆”；二是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兵力近期可能有极大的增长，进一步缩小甚至改变志愿军地面部队的数量优势，使志愿军失去以兵力数量优势弥补技术装备劣势的基础。



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某部指战员进行战斗动员

[1]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页。

[2]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2-5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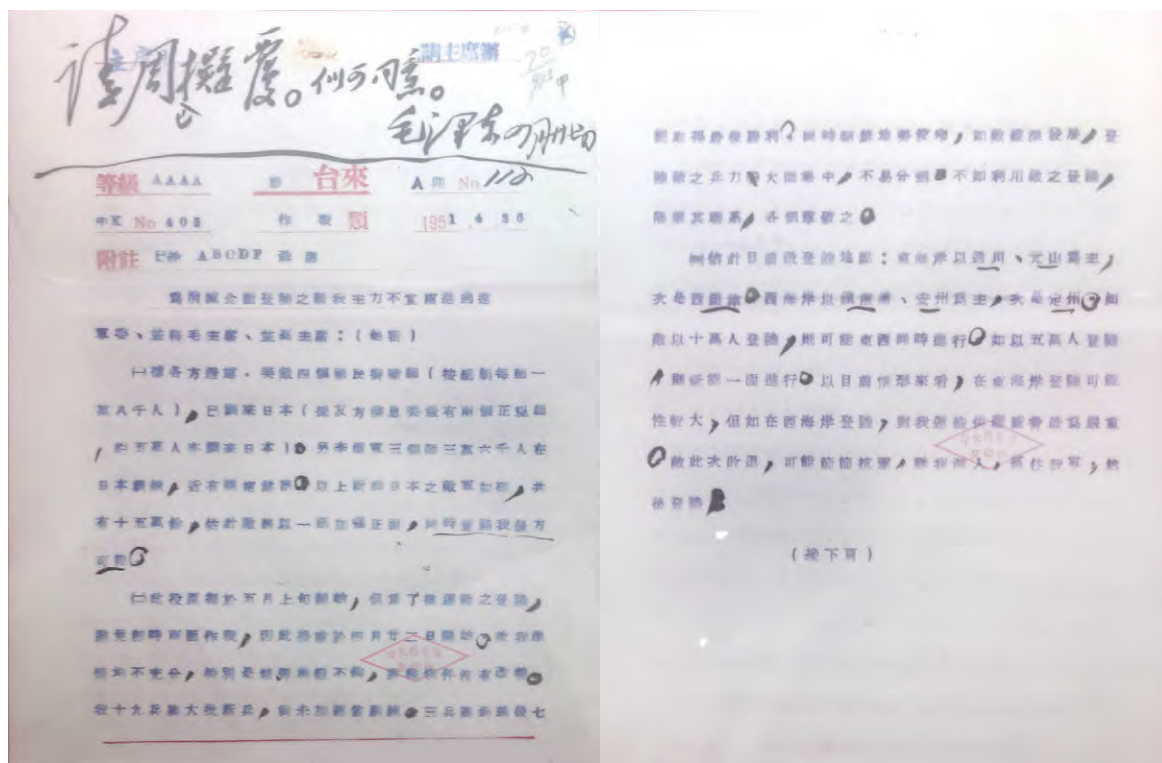
[4]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386页。

为迫使美军放弃登陆企图，避免陷入两面同时作战的不利局面，中朝军队必须抢在美军增援兵力到来之前，抢在美军侧后登陆之前在正面战场发起战役反击。在4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彭德怀指出，“我军反攻时机，以现在为最好，因敌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sup>[1]</sup>，但由于第二番部队尚未集结完毕，无法抓住这个最好时机，所以“如敌进展较快，则决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发起反击战

役；如敌进展较慢，则拟于五月上旬开始”<sup>[2]</sup>。4月12日彭德怀给各兵团的两封电报也都延续了6日的指示<sup>[3]</sup>。4月18日，彭德怀下达反击作战命令，“对命令中预定部署，要求在21日或22日黄昏前开始执行”<sup>[4]</sup>。4月19日彭德怀致电各兵团，“决于22日黄昏按照18日21时预定命令开始攻击”<sup>[5]</sup>。

从最早设想的春季攻势作战到发起第五次战役，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其中第五次战役

的具体筹划、部署和各项准备都寓于前一个防御战役的实施过程中，它为志愿军转入新的攻势不断创造条件，将相对被动的防御直接导向了下一步的积极进攻中。虽然存在临战准备不够充分的问题，但此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再次突破三八线，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所谓的“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彻底破灭了其占领全朝鲜的幻想。（编辑：智佳慧）



1951年4月26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为消灭企图登陆之敌，我主力不宜南进过远”

[1]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2]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3]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  
 [4]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5]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492页。